

国企老总月领6800元车补 权力岂能“自肥”

社会热点

■陆志坚

深圳国企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最近实行的车改方案：总经理每月6800元，副经理每月4800元，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补贴分别为3600元、3200元。有员工发帖说，已经远远超出7月出台公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，堪称“最牛车补”。(10

月17日中国青年网)

月领6800元车补，让人讶然之后，更是羡慕国企的优厚待遇。今年7月，中央两办下发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规定车补标准为：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、处级800元、科级及以下500元。虽然《指导意见》对国企没有明确车改方案，但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应是国企车改的“坐标”，两者的补助标准绝不会像“最牛车补”那样相差5倍多。

而且，据有关资料显示，深圳市去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2619元，折合成月平均工资为5218元。这就是说，国企老总仅月领6800元车补一项，就已超过当地职工的

平均工资。显然，如此畸高补贴已超出了车改范畴，变成了国企的一种变相福利，拉大了社会分配收入差距，违背了车改的初衷。

何况，就国企内部而言，如此车补也放大了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。该国企车改方案规定，总经理每月6800元，而普通职工仅为300元，近23倍的悬殊差距既引起了普通员工的不满，也与国企薪酬制度改革不相符，制造了新的分配不公，有权力“自肥”之嫌。

妥善处理好改革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，这应是全面实行车改的重要因素。但“最牛车补”非但没有平衡国企内部、国企与社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，反而加剧和恶化了多种矛盾，这不是车改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

的目的。倘若容忍和放纵这种离谱车补的泛滥，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各项改革大局。

当然，“最牛车补”也反映出了尽快制订国企车改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。目前，中央各部委的车改已步入实质性操作阶段，县级车改方案规定在明年底前完成。那么，国企车改不能成遗忘的角落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“对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的公车改革，要专门制订方案，适时推出，限时完成”。

我们期待国企车改方案能“限时”出台，切实规范那些离得离谱的车补。

画中有话

酒店弃“星”换马甲为哪般？

■谭敏

近年来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严控会议支出，部分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做出“限星”的规定。政府的规定在酒店业界内引起了一些反应，也催生出了一些应对办法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在全国多地，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，从“五星”变“无星”。今年以来我国“弃星”的10家五星级酒店中，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。

“八项规定”实施以来，高端白酒、豪华汽车皆因持续强力的反腐而受到影响，就连金秋十月上市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也因为几无官员消费，价格跌了四成，由此观之，五星级酒店受“牵连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。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“限星”的政策对酒店打击很大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种公务消费一感冒、企业就开始打喷嚏的现象，说明了“八项规定”确实见成效。可是，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在商言商，五星级酒店主动“弃星”，其反常经济行为的背后，却也提醒我们，反腐不能掉以轻心。

今年“弃星”的10家五星级酒店，半数以上是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。如果这些五星级酒店因为主要支撑业务——公务消费的减少，而导致经营压力过大，转而主动调整市场战略，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普通消费者，俯下身段，降低价格，通过“弃星”实现由高端酒店向大众消费酒店的成功转型，或者放弃暴利，以更实惠的价格适应政府会务要求的转变，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市场起起落落，生意见机行事，本是常事。

可是，“弃星”后的酒店大多数并没有降价，仍维持高价经营。其原因耐人寻



味。很显然，五星酒店“弃星”的低调背后，并非是想转型，而是想着换个马甲，继续抱公务消费的大腿。去年9月底出台的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，“二、三、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(含四星)定点饭店召开。”可能这些五星酒店认为，只要自己的星级降下来了，就可以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换汤不换药，继续享有“三公”消费的暴利。这种想法其实与“矿泉水瓶装茅台”、“小食堂里吃鲍鱼”是一个路子，期望掩人耳目，蒙混过关。

但这种算盘恐怕难以实现，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。随着“八项规定”和“反四风”的强力推进，中央反腐决心坚定。靠公务行为支撑的高档消费市场必然无法长久。而且，在犹豫与观望期结束后，

官员也不敢顶风作案，明知“无星”后是高档消费仍心存侥幸，拿自己的位子和帽子冒险。中央和地方一个接一个的制度和条例正为各种公务消费戴上“紧箍咒”。不仅要求会议“瘦身”，能不开的会就尽量不开，能开电话会议的就开电话会议；对于会议、差旅费用的管理也日益细化和公开。以往那种一张会议费发票可以把什么消费都包进去的情况，已是难以继了。

所以，对于曾把“三公”消费作为主要目标群体的五星酒店和其他高档消费而言，与其费尽心思打政策的擦边球，不如多想想看，如何用价格和服务赢得更多的消费者，不把“三公”消费当成唯一的稻草，而是顺应市场需求，重新定位，方是华丽转身之上策。

古代的霾背不动现代污染的黑锅

■刘昌海

日前，有媒体援引古代气象志为雾霾寻找历史依据，认为“自古有之”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，而到了明代“每隔几年便会光临京城一次”。这篇文章给不少网友造成一种印象，即是对人类活动影响的“开脱”。而专家的意见则很一致：古代是古代，现代是现代。

霾这东西古已有之，这事儿我信。因为霾这个字并不是今天才造出来，霾这种现象也确实见诸于古时史料。不过，我们也得老老实实承认，今天的雾霾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现代的人类活动造成，是现代人类生产与生活产生的污染加剧了

雾霾天气，这实在和古代扯不上关系。

古代的霾背不动现代污染的黑锅，我们自己的责任理应自己来负。就算是明代的北京雾霾“每隔几年便会光临京城一次”，但现在我们的首都情况就要严重得多，两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更何况，“古已有之”并不能成为今天应该存在的理由。比如腐败，比如感冒病毒，都是“古已有之”，但我们该治还得治，听之任之就会出大事。就算是从三皇五帝的时候就天天有雾霾，这种于身体无益的现象我们也应该想办法治理。即使能找到再多的史料证明责不在己，也于事无补。

虽然雾霾历史悠久，但让雾霾登峰造极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，这是定论。是

城市在建设中对环境考虑不周，是工业生产排放过量，是农民秸秆还田时做得过于粗放，是市民生活中汽车、取暖等污染源的过多，使得雾霾来得越来越勤，规模越来越大，浓度越来越高。可以说，雾霾是人类对大自然肆意糟蹋之后，得到的大自然的小小惩罚。

如果说雾霾不断加剧是由于人类的贪婪，那么寻找“古已有之”的根据则是反映了人类的不负责任。治雾霾不能靠风，也不能怨古人。找准自己的原因，减少雾霾形成的因素，让自己生活在清洁的空气中，于自己、于后世子孙有益。我们不能将雾霾作为遗产留给后人，否则，我们自己将来真的可能成为挨骂的古人。

网络反腐 难复旧日“辉煌”

■娄士强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今日就要召开了。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到现在，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我们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，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。其中人们感触最深的，无疑就是持续“打虎拍蝇”的反腐，以及以“四风”为靶标的作风建设。

在印象里，网络反腐这种“体制外”的形式，一度“风生水起”。每天刷微博、看帖子，等待网友发布曝光官员腐败的图片、视频，曾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。随着“打虎拍蝇”的持续开展，官方对腐败案件的查处，无论是力度还是速度，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。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“周一见”，成了群众获悉官员落马、了解反腐进展最重要的窗口，网络反腐已不复往日的“辉煌”。

在网络反腐的语境下，贯穿每一条腐败线索的，更像是举报者与被举报者的个人关系，要么是利益纠葛，要么是情感冲突，那些反腐的制度力量就变成了工具，被用来“精准打击”某个或某几个腐败分子。即便能够做到“举报一起、查处一起”，也不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——网络举报之外存在更多的漏网之鱼。

网络反腐热度的降低，反映出制度反腐的发力，一方面，从前需要靠“炒作”才能获得重视的反腐线索，有了畅通且正规的反映渠道；另一方面，反腐体系反应更迅速、更灵敏，走在了“举报者”的前面。包括各级纪委、检察机关在内的体制内力量，真正成了反腐的主体，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”的说法，“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捉”的告诫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信任。

事实上，以“四风”为靶标的作风建设，也可以看做制度反腐的一部分。从“舌尖上的腐败”到“会所里的歪风”，再到聚焦形象工程，反“四风”涉及到了方方面面，对准的正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无形中提高了对党员干部的要求。作风建设的常抓不懈，是在塑造一种标准更高、管理更严的政治伦理。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，一直感受到压力，时刻不敢放松，就更难有胆量去触碰党纪国法的“高压线”了。

以往在网络反腐的线索中，很多贪官被曝光之时，腐败行为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，可以说到达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。而标准更高的政治伦理，再加上力度更大、反应更灵敏的反腐体系，恰恰起到了防微杜渐的作用。由此不难判断，网络反腐不仅难现旧日的“辉煌”，还会持续“衰落”下去。



邮箱:zkwbzfb@126.com zkrbghe@126.com
监督热线: 15936909988 13838686789